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中国社区地理

刘君德 靳润成 张俊芳 编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中国社区地理

刘君德 靳润成 张俊芳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亦为《中国政区地理》的姐妹篇。作者试图运用新的观点、新的结构体系和最新资料,建立一个较完整的、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地理学学科体系,填补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概念与原理,主要介绍社区的本质概念与意义,社区研究的对象、任务和内容,中国特色社区发展理论及社区的组织与管理;中篇为社区发展与差异,着重论述了中国的社会变迁与社区发展,包括古代、近现代、当代社区的发展,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社区发展与空间差异;下篇为改革与探索,主要对我国城乡社区管理模式、社区建设重点(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与社区保障、社区文化、生态、教育等)、社区规划等进行了论述,并提供了丰富的社区案例。

本书可供人文地理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学科科技人员和高校有关师生参考使用,同时可供政府、社区有关领导和管理干部作为业务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吴传钧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03-048209-9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人文地理学—中国 IV. ①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4604 号

责任编辑:吴三保等/责任校对:刘小梅

责任印制:张伟/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4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字数:511 000

定价:3680.00元(共12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胡焕庸 周立三 宋家泰 钱今昔

主 编 吴传钧

副主编 郭来喜(常务) 王恩涌 许学强 陈寅寅

沈道齐 李润田 吴三保 黄效文 陈宗兴

邬翊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希贤 王 铮 王兴中 王恩涌 邬翊光

刘 毅 刘君德 刘继胜 许学强 杨吾扬

李小建 李文彦 李润田 李振泉 吴三保

吴传钧 吴建藩 吴楚材 张小林 张文尝

张绍飞 张家楨 张耀光 陆大道 陆俊元

陈 航 陈宗兴 沈伟烈 沈道齐 邹逸麟

周一星 周尚意 周钜乾 金其铭 金学良

姚士谋 姚岁寒 郭来喜 郭焕成 黄效文

崔功豪 彭 斌 鲁 奇 谢让志 谢香方

蔡人群

学术秘书 陈 田 毕金初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认识到它的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整体加以优化和调控的可能途径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在很多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人地关系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思想的渊源。比较系统的论述则见诸历代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各类地方志和游记中,涉及面广,但零星而分散,又和其他学科交错在一起,因而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个性是不明确的,只是知识和资料的积累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才随着其他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我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而陆续引进。此后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成立地理学会,并建立了专业的地理研究所,广泛开展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讲授和调查研究,但限于经费,工作规模小,出版成果少。

解放后,地理工作者得到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合各项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在初期的十多年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向原苏联学习,我国地理学基本上也按原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引进了不少原苏联地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加快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即三四十年代原苏联地理界在当时左的政治干预下,把人文地理学当作唯心主义“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引入了我国,致使我国人文地理学中一度出现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而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被视为禁区的极其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原苏联地理学强调发展二元论,把它肢解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属性不同、互不联系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人们敢于从教条的、空洞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重新评估和认识人文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性大,加以历史悠久而变化大,近年又处于改革阶段,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这就为人文地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发展人文地理具有天赋的优越条件。1980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因势利导,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并相应地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推动、交流人文地理研究。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决定在各大大学地理系中开设人文地理课程,个别大学还成立了专业的人文地理研究所,出版《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很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踊跃投入到人文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原先被冷落的一些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现在已成为热门;原先被视为禁区的一些分支,现在有人敢于钻研;至今尚无人问津的一些新学科,也有人开始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确实已走上复兴创新的道路。

今后的发展,总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这就要求联系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问题,主题是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大量实践,逐步总结我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各项人文地理研究工作取得的有效经验,系统建立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生前曾主张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即: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科学家;二要有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三要应用具有本门学科特点的方法;四要在为国民经济服务中发挥非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五要有大量本门学科的成果资料的积累。这五方面的尺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成果出版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是最具体的衡量。

为了系统展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成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组织人文地理学界合力编写一整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包括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争取于近几年内陆续出版。这在学术上无疑是对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阶段总结,还可和80年代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相匹配,完善对中国地理的研究。甚望通过《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出版,把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传刚

1998年中秋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新世纪迤降,纪元晋双千,地理学发展迈入多元多维结构的全息化时代。向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既表征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意义重大,又展示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生命力。

若把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5与16世纪之交航海引起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地理研究空间的大拓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激发了推动力,从而导致近代地理学的萌发,那么500年后的今天,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航天地理学应运而生,“人地关系”将进一步演变为“人字关系”。可以预见21世纪中期,将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人类的“天地生人巨系统”观会赋予地理科学研究全新的内涵,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将推动地理科学产生巨大的变革,不过人地关系仍将是研究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规律和地域分异系统为基本宗旨。作为世界上最高智能动物群体的人类,从其诞生之时,就和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人类的繁衍与发展既受人类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支配,也受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有的学者把地理演化史分为天文时期、地文时期和人文时期,而人文地理学则是研究人文时期的人地系统,亦即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形成、演化、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人地关系论(man-nature relationship)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古典地理著作中便有所论述。《山海经》、《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我国古典地理学发轫期的杰出代表作。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对人地关系先后产生了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思想、天人相关论以及因地制宜等不同流派。尽管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乃至唐代刘禹锡主张人地相关论等,对人文地理学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从而阻碍了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近代学科。

近代人文地理学萌生源于西方国家。德国地理学大师李特尔(Karl Ritter)堪称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他最早阐述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统一性,主张地理学是一门经验学科,应从观察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和假设出发,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1822~1859)这一著作中,探讨了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嗣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同时,又主张由于有人类因素,地理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1882,1891)、《政治地理学》(1897)、《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1901)、《民族学》(1885,1886,1888)、《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1901,1902)等,对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他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所有对人文地理有贡献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19世纪后半期德、英、法、美、俄等国学者在阐述人地关系时,先后出现了“地理环境

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以 F. 拉采尔、E. 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E. 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代表;“二元论”(dualism)——以 O. 佩舍尔(Oscar Peschel)、F.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和 A. 彭克(Albrecht Penck)为代表;“或然论”(possibilism)——以 P. 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Jean Brunhes)和 G. 弗勒(Herbert G. Fleur)为代表;“适应论”(adaptablism)——以 P. 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为代表;“文化景观论”(cultural landscape theory)——以 O. 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S. 帕萨尔格(Siegfried Passarge)和 C. 索尔(Carl Owtwin Sauer)为代表;“协调论”(adjustablism)又称“和谐论”(harmony)——以 B. A. 阿努钦(Всеволо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учин)、M. 怀斯(Michael John Wise)为代表。这些学术流派先后传播到中国,对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自 16 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殖民地不断扩大,伴随这种大扩展,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不少新的地理知识。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u, 1552~1601)、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1649)、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 1559~1654),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法国人白晋(Joach Bouvet, 1656~1720)、杜德美(Petrus Jartoux, 1668~172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1774)等。19 世纪以来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考察,对中国地学(包括人文地理)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 1866~1952)、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n, 1870~1946)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2~1955)等。

20 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家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人文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自然会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既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先驱。他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22)、《天时与战争之影响》(1923)、《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是竺老早年对人地关系之论述。丁文江先生的《关于中国人文地理》(1923),张其昀先生的《中国人之传统》(1926)、《人地学论丛》(1932)、《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1935)、《论中国之人地关系》(1947),翁文灏先生的《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1929)和《中国人口之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胡焕庸先生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安徽之人口密度与农业的区域》(1934),黄国璋先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1941),李旭旦先生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王成组先生的《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1941),周立三先生的《农业地理》(1942),吴传钧先生的《中国粮食地理》(1942),陈尔寿先生的《重庆都市地理》(1943),任美镠先生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等等,对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建设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以刊物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季刊,1942~1949 年共出 6 卷,发表论文 136 篇,其中人文地理学论文即有 56 篇,若把地理学通论、地理学思想史、区域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育等论文计入,则人文地理论文居于绝对优势,这种格局和国外地理学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30 年代初王海初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等所著《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30 年代中任美镠、李旭旦先生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eographie Hu-*

maina),陈健民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葛绥成先生翻译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环境与人》(*Environment and Race*)(也译为《人种地理学》)等,在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起过不同的作用,特别是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所提出的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做的事业按三纲六目人地学基本事实来阐述,并指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也可影响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随科技发展水平而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作用是相互的,而人类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在中国影响十分深刻。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造就“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大气候,在地理学界,尽管对推动现代中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劫难。某些人把原苏联30~40年代非常时期的学派之争,生搬硬拉强加于中国地理学界,且无限上纲,恣意扩大,以致把人文地理学赶出学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记得1955年正当批判人文地理学高潮迭起之际,我在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称作“人文地理学批判”,它不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某种学术观点、思想和流派,而是批判这门学科,并给予全盘否定,满篇都是政治大帽子,诸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帝国主义服务”、“伪科学”等等,给当时青年学子们纯洁的心目中,造成了“人文地理学”与“恶魔化形象”等同的极坏影响。这样,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大地上便无立锥之地,被逐出地理学界。那时老师授课无讲义,更无教科书(也许奉命而教,违心讲授),我的笔录较详,还被一位报考留苏同窗借去参阅。嗣后我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并没有感受到像国内那样剑拔弩张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当时苏联地理界已在起变化,随即出版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导致原苏联统一地理学的复兴,出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化,并以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名义在原苏联恢复了人文地理学。

极“左”思潮在地理学界某些人群中泛滥,造就一些专门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学术新贵”,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若干年后还在肆虐,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和蹂躏。“文化大革命”中连经济地理学也不复存在,研究队伍被迫改行。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300多位地理学家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收到900多篇论文。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李旭旦先生的《人地关系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和吴传钧先生的《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又名《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揭开了我国复兴人文地理的序幕,迎来了人文地理学的春天!

李旭旦先生在报告中指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得到长足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应有所改变。”李先生进一步阐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近年西方国家还出现感应地理、行为地理学科,内容极为丰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因此,李先生疾呼:“应该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绝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期西方各

国的各种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今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论题等。”

如果说在复兴人文地理学中,李旭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那么,吴传钧先生则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组织家和实践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工作(20世纪80年代扩展为经济地理研究部),则在经济地理的大旗下,掩护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领域,除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外,还有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等,一个研究室竟有近60名研究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传钧先生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在于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基础上,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主要内容包括:①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趋向的理论;②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与风险分析;③两大关系间相互作用和物质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整的途径与对策;④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⑤根据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结构潜力,预测特定的地域系统演变趋势;⑥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⑦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研究方法,使人文地理研究得以升华。

我清晰地记得,李旭旦先生做完学术报告后,1980年元旦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召开敬老座谈会,出席会议的12位70岁以上的老地理学家(如今大多作古)中,有不少多年没有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出席广州盛会激动不已,座谈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董绍良先生说:“我20年代就接触人地相关论,这次会上听大家谈人文地理学,我真像遇到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为了繁荣人文地理学而勇于创新。”

然而就在会后不久,有着失落感在“文革”中又自命为“红线代表”的某位以批判他人出名的人物,在座谈会上做了肤浅应景式检讨和言不由衷的道歉后,竟又炮制新的“批判”大作,罗织罪名,妄图把复兴人文地理之举,当作“回流”、“复辟”、“新动向”,再度置人于死地,李旭旦先生首当其冲。《西北师范学院院刊》把李先生的复兴人文地理学的论文和“批判”文章同时刊登,更增添了对他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委托李旭旦和吴传钧先生担任人文地理学分册主编,1981年冬在上海举行大百科条目研讨会,李先生忧心忡忡,此时,吴先生劝慰说:“难道您还怕戴第二次帽子?!时代不同了,不必理那一套!”

1982年2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人文地理的重要讲话,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把人文地理学列为要加强的薄弱学科之一,从最高层次支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一度对人文地理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家”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不

能不说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为了适应人文地理学新发展,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杭州会议决定成立人文地理研究筹备组,推举8位学者为成员,李旭旦先生任组长;1983年5月在南宁举行首次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吴传钧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组,李旭旦先生为组长。198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4年7月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人文地理讲习班,加速培养高校人文地理师资。之后中国地理学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学院又举办了几期人文地理师资培训班,使人文地理师资培训和科学普及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李旭旦先生作为首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抱病参加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作了“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讲话。李先生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准则,走正路,技术手段必须创新,论题内容要创新,要采取实地考察与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向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进军……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人文地理讲习班,但他仍以教育家的智慧和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这项活动。在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协助下,他主编了《人文地理论丛》、《人文地理概说》两本论文集。

李旭旦先生的仙逝,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在吴传钧先生直接领导下,由鲍觉民、张文奎先生主持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文地理学研究与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更上一层楼。鲍、张两先生的辞世,又一次使人文地理学界蒙受损失!

综观近14年来,我国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5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在西安举办的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在无锡召开的中英日城市地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人文地理学研讨会;1990年8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会议;1990年11月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3年5月与沿海开放研究分会在昆明共同举办的沿海沿边开放学术研讨会;1996年11月与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郑州联合举办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1997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8年4月在北京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从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分立出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还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育与研究会,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人文地理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列入全国高校的必修课,有的大学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了重点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设置了博士点、硕士点。

近10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中英文版,1988)、《人文地理研究》(1989)、《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等会议文集,吴传钧先生主编出版一套《人文地理学丛书》,创办了《人文地理》杂志(原名为《国外人文地理》)。一些学者还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专著,如《中国人文地理》、《现代人文地理》、《理论人文地理》、《人文地理概念》、《人文地理学》,以及多版本的《人文地理词典》等,还有更多的分支学科专著先后出

版。一大批青年人文地理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中坚,使中国人文地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特别是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心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和核心地位更凸现出来。

钱学森先生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史出发,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时,明确指出以研究地球表层为对象的地理科学的内容与方法。他高瞻远瞩地指明:“地理科学是一门学科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大部门之一,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地理系统是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研究。地理工作者要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从事“地理建设”,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 3 个层次来建设“地理科学”。黄秉维先生认为,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充分运用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成果,从区域解释性描述和地理数据图表简式表述,向全球与区域的监测、规划、设计、调控、优化方向过渡,实现不同尺度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逐步达到钱学森先生所期盼的“地理建设”和“地理科学”的前瞻性设想。

鉴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丛书),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自然地理学及各主要分支学科方面的成就,如今编辑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既是体现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全面评估中国地理建设成就的需要,也是为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实现中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自 1992 年酝酿、策划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以来,先后在北京、昆明做了多次协商,又于 1996,1997,1998 年分别在开封、西安和北京召开三次丛书编辑委员会,集中讨论了丛书编辑的宗旨、书目、纲要、体例、结构、分工和进度,确立了精而准、系列化、中国化的撰稿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位专家及其代表,一致表示争取在 1999 年完成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迎接 21 世纪来临的献礼。

借此良机,我谨代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丛书编辑委员会,向为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做出贡献,参加丛书编辑出版,以及支持和赞助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1998 年 4 月 22 日于北京中关村

前 言

在本书出版之前,我国尚未有“社区地理学”的著作问世。

1999年,当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和靳润成、周克瑜同志合作编著的《中国政区地理》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设想,希望有一本与之相呼应的《中国社区地理》出版。为此,我向《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编委会提出了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丛书》主编吴传钧院士、常务副主编郭来喜和副主编、本书责任编辑吴三保以及朱海燕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列入出版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中国社区地理》的书稿,并得以出版。因此可以说,《中国社区地理》是《中国政区地理》的姐妹篇。

“社区”是与“行政区”相对应的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社区”是社会空间实体,“行政区”是一个国家的地方行政机关所辖的地域,是行政空间实体,前者属社会,后者属政府,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当今的中国,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从学科性质来看,二者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社区”属社会地理学,“行政区”属政治地理学范畴。“社区地理”和“政区地理”都是人文地理学的新兴领域。

现代意义的社区起源于西方。1887年德国学者滕尼斯出版的一本名为《社区与社会》的著作,标志着社区理论的诞生。大约是在20世纪的20~50年代社区理论和研究,从欧洲传到美国,进入兴盛时期。“社区”概念引入中国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1949年建国以后,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整个社会科学处于停滞状态,“社区”一词几乎被人们所忘记。“社区”兴起、并被广泛重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的转型,人们逐步认识到,社区建设在推进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城市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0年1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面向新时期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切实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城市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从“社区”作为社会的基层细胞和其本质属性来看,它属于社会学的重要领域;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社区是一个社会空间,属于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社会地理学范畴。我们认为,无论是从推动社会(社区)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还是从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的需要来看,都应该十分重视社区地理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

首先,20世纪战后的世界,一方面是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一方面是两个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主要是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是

^① 多吉才让主编,《城市社区建设读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

社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一方面是财富向少数富人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大批新贫困人群的不断增长。人类进入 21 世纪,世界并不太平,生活并不安定,不平衡、不公平仍然是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这种不公平和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而且在一国内部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之间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社区发展的空间差异十分明显。因此,从宏观层面看,“社区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地理科学工作者理应关注和研究这一领域,并大有可为。

第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和世界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程相似,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体制改革的深入,地区社会问题、城乡社会问题突显,大量的社会问题在城乡的基层社会——社区这一平台表现了出来。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将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乃至政权的巩固。这一新的形势迫切需要大量人文地理工作者积极投身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社区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从学科发展方面看,作为微观社会地理学的社区研究在国外已有很大发展,其主体属社会学、人类学范畴,政治学、人文地理科学、城市科学、农村聚落科学、环境科学也多有研究。但总体上看,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社区地理学科。在国内,目前社会地理学科远不如其他人文地理学科那样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有的只是城市地理学、农村聚落地理学中涉及社区问题的研究;为数不多的城市社会的分区研究也鲜有深入到社区领域。地理学者参与社区研究的更是屈指可数,社区的地理学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这种状况与中国社会变革实践对人文地理工作者的新需求极不相适应,不利于中国人文地理学科的发展。

我们之所以将社区从社会地理学中独立出来,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细胞,属微观研究范围。社会地理学侧重于社会现象的宏观与中观的研究,其与社会的基层单元——社区,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不能完全等同。其二,社区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在现阶段,社区发展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将社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利于在实践中推动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其三,社区不仅是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还涉及城市科学、农村聚落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社会地理学已难以全部涵盖社区领域,而将社区地理独立出来,有利于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社区地理学是社会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基层社区和农村聚落社区,它是研究城市和农村社区的空间分布、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揭示其空间特征及其成因、预测其发展趋势的一门新兴学科。与社区地理学关系最密切的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城市科学、农村聚落学等及人文地理学的相关分支学科。从社区的本质内涵来看,毫无疑问,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社区的形成、发展、演变受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但“社区”作为地理空间实体,又会受到许多地理因素(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人文地理因素对社区的形成发展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至少是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见,社区地理学具有学科交叉的性质。社区地理学十分强调社区的地理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分析,强调社区的空间地域结构特征的研究,强调地理环境与社区发生、发展过程的相互作用的研究。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社区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国家高层领导人和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如今,社区建设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中国的社区建设的春天到来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科学工作者参与社区建设、研究社区问题是义不容辞的事。地理工作者完全可以在参与社区建设中直接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做出贡献。我国的社区建设正在向纵深发展。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社区将真正成为城乡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我国社区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社会学界比较偏重于“舶来研究”;二是政界为主的偏重于“本土研究”。前者多借助于西方的社区理论,研究中国的社区发展;后者多从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社区建设中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上述两个不同的视觉相辅相成,促进中国社区理论和实践水平的提高。

中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国家,政府主导地方一切事务,社区建设也不例外;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化发育的程度还很低;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自然、经济、社会、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很大。因此,在社区建设和研究中,要考虑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政治体制背景,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使研究成果有利于推进各地的社区发展;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区发展理论和社区地理学理论体系。

《中国社区地理》是一部全面介绍中国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进展的著作。作者试图通过借鉴国内外(主要是国内)多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社区研究的成果(包括我们自己和我的学生们的研究成果),经过综合分析、研究,从中国国情和地理学科的特点出发,构建一个科学、完整的中国社区地理学科体系。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概念与原理”,中篇为“发展与差异”,下篇为“改革与探索”。上篇1~7章,初步建立了社区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包括社区的概念、意义及研究的进展,社区地理的对象、任务、方法,社区的方法论理论基础和本体论理论内涵,社区的空间属性、组织与管理等内容。中篇8~14章,在对中国社会变迁与社区发展的关系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社区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空间差异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包括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乡村和城市社区发展,以及当代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社区发展等内容。在社区发展空间差异部分着重对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和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下篇15~21章,在对中国社区发展改革总体思路把握的基础上,重点对中国当前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服务和社会保障建设、社区生态建设、社区文化建设以及学习化社区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最后探讨了中国社区规划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可见,这一体系基本与《中国政区地理学》相呼应。

应当指出,从地理学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的社区问题既是一项内容复杂、需要耗时较多的艰巨工作,又是一项需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本书稿得以完成,不仅是我们几位同志共同努力、协同作战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与我的学生们近几年来参与社区实践、完成多项社区研究课题和我指导下的多篇社区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综合写成的。其中已经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程玉申的《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张玉枝的《转型中的社区发展——政府与社会分析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和本书作者之一张俊芳的《中国城市社区空间组织管理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这些都为本书的编著提供了重要基础。

本书由刘君德设计总框架,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分工执笔,我的博士生陶希东进行了资料收集、大量文字输入和部分章节的初稿编写工作,最后由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通

稿完成。陈占彪副教授协助进行了文字修饰。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不少社会学者有关社区研究的论著,已在参考书目中列出。

我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社区产生兴趣、并介入社区研究的。1999 年末,在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张明亮司长支持下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我有机会参加了全国的各类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使我对全国的社区建设情况和理论研究动态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这也是我能完成本书写作的十分重要的条件。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中国社区地理是一项开创性、填补空白的工作,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尚处于初创阶段,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尚较薄弱,尤其是如何加强社区问题的地理性研究,需要在社区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提高。因此,书中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同时,希望更多的地理工作者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实践,共同为推进我国的社区建设、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区地理学做出积极贡献。

刘君德

2004 年 6 月 31 日

于上海华东师大三村寓所

目 录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i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iii
前言	ix

上篇 概念与原理

第一章 社区的概念与意义	1
第一节 社区的概念	1
第二节 社区的基本要素和特质	3
第三节 社区类型与城乡社区比较	8
第四节 新时期我国社区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意义	13
第二章 社区研究进展与评述	17
第一节 西方社区发展进程与相关理论	17
第二节 国外城市社区发展的历史脉络	23
第三节 中国社区的发展与研究	28
第三章 社区地理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39
第一节 社区地理的对象和性质	39
第二节 中国社区发展与社区地理研究的任务和重点	41
第三节 社区发展与社区地理的研究方法	45
第四章 社区地理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50
第一节 社区的哲学原理	50
第二节 社区的政治学原理	52
第三节 社区的社会学原理	58
第四节 社区的经济学原理	61
第五节 社区的管理学原理	64
第六节 社区的地理学原理	66
第五章 社区地理的本体论理论内涵	69
第一节 社区的社会体系理论	69
第二节 社区的结构功能理论	71
第三节 社区的社会行动理论	73
第四节 社区的人文区位理论	76
第六章 社区的多重空间属性与影响社区的因素	81
第一节 社区的多重空间属性	81
第二节 城市发展的历史特征与时代特征对城市社区的影响	84